

● 现当代文学

状物与文学性

冯 黎 明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冯黎明(1958-), 男, 河南安阳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史研究。

[摘 要] 汉语的辨义基础是“形—义关系”, 因而字形状物是汉语的意义生产、表述的突出特征。汉语文学能够在字形的展示中提供关于物质世界的感性生命经验, 同时字形状物也造成了汉语文学超验意义和诵读意义的不足, 所以, 汉语文学力图把“意境”和“音韵”注入感物、咏物之中。在技术物品代码主宰人类的理解和交流的现代文化中, 汉语字形状物的文学性特点对于恢复人对物质世界的感性生命经验具有独特的功效。

[关键词] 汉语文学; 字形状物; 诵读性意义

[中图分类号] I 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5-0580-05

一

许多年前, 我曾用拼音和汉字抄录王维《鹿柴》一诗给一位初识文墨的小学生读:

Kōng Shān Bú Jiān Rén,	空山不见人,
Dàn Wén Rén Yǔ Xiǎng。	但闻人语响。
Fǎn Yǐng Rù Shēn Lín,	返景入深林,
Fù Zhào Qīng Tái Shàng。	复照青苔上。

学生读了拼音文字的《鹿柴》后, 茫然不知所云; 而读了汉字《鹿柴》后, 却可以朦胧地描述出与诗义接近的一幅自然景观。这里的差异根本上来自汉字以形辨义的功能。因为在图案化的字形中, 阅读者能够通过视觉联想感应到某种被指涉的自然物形貌, 所以他得以接近诗的语义。

以拉丁语为代表的拼音文字是借助音位即音响在历时性中的变异组合来建立语义辨识系统的, 而以汉语为代表的象形文字则是借助于线条(笔划)组成的视觉图案建立语义辨识系统。因此, 语言学界也有人认为, 拉丁语是句本位语言而汉语是字本位语言。字本位的汉语中, 每一个字都是一幅指事或状物的图画, 它能够独立地言说某一“原子事实”。20世纪20年代, 刘廷芳先生通过实验发现, 汉语中字形对字义的作用大于字音对字义的作用。40年代末, 著名语言学家艾伟先生在《汉字问题》中提出, 汉字的基本辨义原则是“形—义关系”。从语义辨识的角度来看, 形—义关系原则具有直接指称物体形貌特征的优点, 因此, 汉语的语义辨识要比拉丁语容易。这并不是说汉字中没有表音元素,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汉字的表音元素是以偏旁形式出现的。而且这些用于注音的偏旁原本也是一些象形的图案化文字, 后来出于造字时表音的需要而将其简化为偏旁。大部分注音的偏旁仍显示出原初的象形含义。

当然, 一切语言都是在对外物命名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指称性是语言的基本性质, 但音位辨义的文

字是通过指称关于物的概念而间接指称物体的,而汉字则是通过把自身的形体变成物体的图画直接指称物体的。推崇书写的首要性的德里达声称:“中国文字在我眼中更有兴趣的常常是那种非声音的东西。”^[1](第11页)这种“非声音的东西”就是汉字的字形状物特征。字形状物与音位对概念的表现是很不相同的。前者保持了物的形貌在语言中的出场,而后者却将物隐匿在概念的背后;前者使人在语言活动中直接感受到物质世界的具象形态,而后者则在物的具象形态中加入了概念对物的逻辑序化;前者使人在物的形貌中寻找意识性的语义,后者让人在概念的规定性中寻找“客观对应物”。我们或许可以把汉语称作一种“不完全形式化”的符号系统。这种不完全形式化的符号系统对科学精神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但它却是一种典型的诗性符号,因为它借助状物使得物的表象不脱离语义,大地的身影时刻在符号的言说中“出场”。钱钟书说:“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2](第1卷第12页)在这方面,汉语堪称典范。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诗、书、画三者共溶,其原因便是汉语文字的字形状物。字形状物带来了诗对物的感悟、画对物的描摹和书对物的仿形三者交叉渗透。

从语义层面来看,任何语言体系都可能在“言说—聆听”、“书写—阅读”和“物象—概念”这三层关系中形成意义,但在音位辨义和字形状物两种语言体系中,语义内涵的支撑点却不尽相同。字形状物的语言长于物象在视觉联想中出场,而短于音位对言说者观念的表现。音位辨义的语言中,言与义的直接关系彰显了言说者对超验意义的领悟,但又遮蔽了物的出场。这种语言为“我思”提供了便利,而使得词的摹状意义处于缺席状态,所以西方文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表现和再现的关系。对于汉语来说,字形状物使得言与象直接发生关联,因而它彰显的是物象的视觉意义;言与义的隔膜又使得诵读性意义缺席,超验的观念意义在物象中的出场遭遇阻碍。所以,中国传统文学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在个别实在的物象中领悟超验观念的问题。中国古代诗人喜欢咏物,咏物之“咏”乃在于以诵读行为叩问观念化的普遍意义。

郜元宝先生在《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中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了古典“字本位”而将语言基础设定为音本位的“口头说话”^[3](第53-73页)。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生成的民族语言,很难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完全改变。汉字的状物辨义的性质,并没有因为白话文的流行而变成拼音文字的音位辨义。我倒觉得,白话文的普及在汉字的视觉化字形状物的特点上又加了一些诵读性带来的声音化语义,这使得本来就保持着世界之物质外态的汉语在语义的生产机制方面更为丰富了。最近,英国科研人员发现,说汉语和说英语时,大脑的活动机制有所不同。说英语时,靠近左太阳穴的左颞叶活跃,而说汉语时,左颞叶和右颞叶一起活跃。联想到斯佩里(R. Sperry)对裂脑人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英语是抽象形式化的语言,汉语则因其不完全形式化的特点而有着较强的形象感。

二

以字形状物为语义支点的汉语,在文学活动中显示出一系列鲜明的特征。首先,汉语文学以物象为所指,而且物象与字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了汉语文学的视觉意义的首要性特征。在古典诗词中,我们见到最多的就是自然化物象外观的排列。即使是在叙事文学中,汉语文学也倾向于对人或物的“可见的”外观进行白描,而不像拼音文字的文学那样倾向于描述事件的“精神性”过程。这种对自然物象的外观的展示使人在文本中时刻感受到生活世界的物性存在,而不致走向超验的纯观念境界。这大概就是庞德赞赏中国古典诗的原因之一吧。其次,汉语以字为本位的状物使汉语文学的自然物象呈现为一种平行对应的构成方式。高明的古代诗人都善于将物象以字或单词的形式作等价并列的表述,取消句子层面上的主谓关系或动宾关系。许多古典诗词在句法层面上是残缺不全的,构句的谓词、连词、介词被有意取消,但因为物体名称本身在字形上的视觉联想意义,叙述性的语义反而更加突出(清代文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称之为“语不接而意接”)。“诗中有画”的真正秘密就在这里。第三,字形状物一方面使古典诗人们得以不离物象,但同时也使得他们力图在个别物象中追问和领会一种超物象的精

神意义。字形状物固然可以带来主体生命经验的鲜活,但囿于个别物象也会造成超越性和普世性意义的不足,因此古典诗人在咏物活动中倾力追问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境界。古典诗词中的“意境”不仅是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的结合,更是有限的经验物象与无限的超验意旨的结合。第四,长于视觉联想意义的汉语用状物遮蔽了语言的诵读性意义,于是在音位层面上出场的语义就遭到了压抑。所以,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发展出一套强化诵读性的机制,其策略表现为将状物的汉字纳入某种音律组织之中,这为诗歌带来了句子层面上的节奏感和音位变化。戏曲中的“唱白”就是一种典型的强化诵读性语义的策略。王世贞在《典藻》中曾提出,戏曲中应显示文字的“声情”。他似乎感觉到了,意义不仅需要“辞情”,也需要声音所创造的一种非指称的生命经验。周锡珪先生考据过,早期的汉语诗是不押韵的,西周中期以后才出现一些押韵的四言诗^[4](第137-152页)。而且,后来音律越来越为诗人们所讲究,这说明诗人们对音位变化层面上的语义的追求越来越强烈。

在中国文学史上持续性地出现过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学观念,即讲究音韵形式和追求指物语义的文学观念。实际上这里关键在于汉语的两个突出特征在文学意义的生产和表述中的疏离:字形状物和诵读意义缺席。前者使汉语文学“言之有物”,即指涉物自然而然地出场;后者则使得诗人们寻求音位变化层面上的语义,因为诵读性语义的缺席让人意识到意义的生产和表述的有限性。坚持状物本位的文学观念视物象的在场为语义价值,而企图弥补诵读意义之不足的文学观念则希望用强化音韵的办法来获得超物象的语义。对音韵的追求其实不能归于所谓形式主义。《诗大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可见,文字的不足是可以音响形式来弥补的。从语言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音位变化层面上生产出来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主观性,较之由字形状物层面上体现出来的视觉指称化的意义来说,它传达的是语言主体对物的态度或评价。比如后代词人取唐诗句子,重新断句为长短词句,其指涉物没变,但语义有变,因为节奏感的变化令人感到了词人的心态的变化。这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句话,说出来的含义比写下来的含义要丰富,因为说话时处理节奏和轻重音的方式可以表明言说者对所指事物的主观态度。对于音位辨义的语言体系来说,声音与语义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毋庸置疑的,因此语义内涵的主观精神性更强,音律的讲究也不会遭到内容空洞的指责。在欧洲,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提出,完美的诗就是声音的一种可愉悦性的排列。罗马时代的西塞罗和昆提里安认为“‘听觉的判断’(aurium iudicium)在语言艺术中是重要的”^[5](第309、310页)。

意义这个概念,既不能像罗素那样将其单单理解为指称,也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将其单单理解为用法。胡塞尔认为,意义包涵三层内容,一是意向性,二是概念的观念内涵,三是指称对象。这在文学语言中就体现为言说者的态度、字词的规定性内涵和指称对象。汉语以字形状物的方式将指称对象紧紧地捆绑在文字中,因此无论言说者有着怎样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和怎样抽象形式的意识,人对物态世界的感性生命经验都会在场。在汉语文学史上,言与象的关系从来不构成表述障碍,而言与意、象与意的表述关系却令人反复思考,因为这中间存在着表述的障碍。字形状物意味着言的在场即物的在场,“感物”和“咏物”是要从在场之物的表象中追问、领悟“不尽之意”和“韵味”。正是因此,汉语文学一般不会让人落入不及物性的能指游戏或抽象的概念沉思,它总能让人感觉到物性世界的外态,从而保持一种鲜活实在的感性生命经验。我甚至觉得,这一点不仅是汉语文学的文学性的特点,而且也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用物象类比的方法阐释概念和个别化的感物式思绪都受到汉语文字的字形状物的影响。

三

假如我们抛弃传统理论用诗学精神、文本结构和修辞技艺界定文学性的作法,把文学性视做以隐喻性的语言形式生产和表达意义的活动,那么,文学性就可以在发生学的概念上成为一切意义的策源地。如海德格尔所言,诗性语言是一种原初的语言,诗是真理的自我显现。叶姆斯列(L. Hjelmslev)说所有的科学都聚集在语言学的周围^[6](第82页)。这也意味着原初的语言活动是创造一切意义的起点。我们

对文学性的探讨既不能脱离语言去建立充满审美神秘主义的诗学象牙塔,也不能让语言游离出意义,变成纯形式化的能指游戏。语言活动对意义的生产和表述是文学性诞生的基础。因此,文学性总是潜藏在特定的语言系统的运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汉语文学的文学性比探讨文学性更为重要。在我看来,汉语作为一种不完全形式化的符号系统,由字形状物形成的视觉联想的形—义关系辨义原则,是汉语对意义的生产和表述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汉语文学,总是能够把物质世界的表象凸现出来,因而能够为符号活动提供关于物质世界的感性生命经验。但指向个别物象之外态的字形状物也造成意义的有限性和诵读语义的缺席,因此,汉语诗人们力图通过创造意境和强化音韵来形成“多重复杂的语义价值”(洛特曼)^[7](第88页)。

就语言形式与意识的关系而言,现代科学是一种完全形式化语言的结果。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技术化社会,使人类生存在一种技术文明语境中。技术化社会不仅为人类的生存构筑了一个人造物品的世界,而且在技术物品包围人类精神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代码的世界,即法国学者马克·第亚尼(Marco Diani)所称的“非物质世界”。“这是一个人造物或非自然物狂喜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对真理的追求是通过幻想的命令进行的”^[8](第910页)。于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就出现了一种非自然主义、非历史主义的精神生活趋势。我们失去了意义的物性基石,过多地沉迷在能指的自我游戏之中。而这些能指在我们的语言形成的历史中曾经是自然物意象的代码,它为我们提供了与自然物亲和相处的诗性经验。但技术化社会驱走了自然物,我们语言的能指只好孤独地出场了。从索绪尔到罗兰·巴尔特的时代,人们还曾为能指的解放而欢呼雀跃,此后,“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人类已经没入词句的汪洋大海中”^[9](第4页)。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人类的语言,诸如“hello”、“goodbye”一类的词将逐渐被替代。也就是说,原来建立在自然物意象基础上的语言正一步步地被技术物品代码取代。在这样一种文明语境中,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意义的生产、表述和理解活动必然面临两个结果:其一,技术物品代码主宰着我们的理解和交流,并将一种数据化的、抽象的、工具理性的意识形式置于精神生活的主体地位;其二,不及物性的代码使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性生命经验越来越趋于淡漠。事实上,从现代高新技术介入人类生活世界以来,我们就开始了为日常生活注入审美性和寻找新物感的持续努力。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赛格雷(E. Segre)说:“抽象化和脱离直觉经验的潮流,并不只限于物理学,恰恰相反,这几乎是现代思想和艺术的特点。”^[10](第329页)这个特点使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失去坚实的大地,失去历史;人们对自己的精神隐入空泛而抽象的能指游戏越来越不满。这里的最大问题就是虚无主义。从尼采开始,西方思想出现了对虚无主义的反抗,但言论转向似乎加重了虚无主义在文化中的分量。尤其是回到那种“形而上学的语言”之中,虚无主义更是借能指游戏演化为一场后现代主义的噩梦。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历史主义的登场为标志,西方文学理论开始努力治疗“抽象化和脱离直觉经验”所带来的病症;甚至于在科学中也出现了格里芬(D. R. Griffin)所说的“返魅”的倾向^[11](第43页)。中国文化有着比西方文化更强的自然家园感和历史归依感,因而我们必须对“抽象化和脱离直觉经验的潮流”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以信息化和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的现代高新技术日益主宰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趋势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套回避其负面文化效应的策略。策略之一,就是认真研究汉语的字形状物的文学性特征并发扬光大之。汉语文学在这方面的特点,即物象和能指的紧密结合,使语言活动的主体能够时时保持对物质世界的感性生命经验,从而得以维系精神与生活世界的整一性关系。在汉语中,虚无主义将得到有效的克服。

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那些优秀的诗人,大都长于感物、咏物,在对个别物象的品味、咀嚼中领悟宇宙、历史和人生的意义,因此,他们很少有与大地疏远的痛苦。即便是在现代汉语文学中,那些优秀的文本都不是靠编织戏剧性场景或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的。这些作家非常善于品味物态现象(肢体或器物)的韵味或潜在语义。这方面最杰出的要数张爱玲。张爱玲不是编故事的巨匠,也不是抒情的大家,她的作品中充满了一种新物感。物态现象在她的笔下被罩上了一层奇异的的光晕(就像木雅明说的那种造就了

作品之艺术性的 aura)。卫慧的《上海宝贝》也展示了大量的器物,但她对物的表述仅止于工业产品品牌名称,缺乏张爱玲式的光晕。卫慧更像是一个患了恋物癖的精神病人,不像感物、咏物的艺术家。

这并不是要在叙事超出了状物的时代让汉语文学去描绘自然物,而是说要利用汉语的状物天性为汉语文学的叙事营造一种独特的风貌,即把字形中透露出来的物感植入叙事的意义生产机制之中,这样叙事就可以在充满感性生命经验的境界中展开。

[参 考 文 献]

- [1] [法] 雅克·德里达. 写作与差异[M]. 张宁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2] 钱钟书. 管锥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3] 郜元宝. 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 当代作家评论, 2002, (2).
- [4] 周锡馥. 中国诗歌押韵的起源[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4).
- [5] [波] 符·塔达基维奇. 西方美学概念史[M]. 褚朔维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0.
- [6] 冯志伟. 现代语言学流派[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7] [南非] 罗里·赖安, 苏珊·范·齐尔.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C]. 李敏儒, 伍子恺, 等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 [8] [法] 马可·第亚尼. 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C]. 腾守尧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9] [法] 海然热. 语言人: 论语言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 张祖建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10] [美] 埃·赛格雷. 从 X 射线到夸克——近代物理学家和他们的发现[M]. 夏孝勇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4.
- [11] [美] 大卫·雷·格雷芬. 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C]. 马季方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何坤翁)

Simulation of Objects by Graphemes and Literariness

FENG Li-m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ENG Li-ming(1958-),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theo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base of the dialectic meaning for Chinese is a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pheme and Meaning, so the simulation of objects by graphemes i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oduction and expression of meanings in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literature can offer the geistic life experience about the material world in the exhibition of graphem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at simulation results in the lack of transcendental and declamatory meanings. That is also the reason for which Chinese literature tries to infuse “realm” and “melopoeia” into the recept and intonement of the world. In today’s modern culture where technical codes dominate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we human beings, the lite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mulation of objects by graphemes has a special efficacy on the renewal of human’s geistic life experience about thereal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imulation of objects by graphemes; declamatory meaning